

# 美国动态

(半月刊)

2018年 6月22日 (第171期)

内部交流 仅供参考 请勿引用

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 美专家：中国真正带来“威胁”的是其人才和科技

中国给美国带来的真正威胁是其人才济济和科技发展迅猛，这凸显了当前中美贸易谈判的重要性。尽管贸易问题可能会引发波动，但投资者应该继续寻找机会增加对华投资。

## 兰德公司：美国“千禧一代”是这样看待“安全”的

若按“世代”（generation）来划分，美国“千禧一代”是最不担心安全问题的群体，然而，他们是对经济感到最为焦虑的群体。

# 中美关系

## 美学者：中国太空项目对美国构成挑战

美国传统基金会网站 6 月 11 日登载该智库高级研究员成斌 (Dean Cheng) 的文章称, 中国于 5 月 21 日成功发射“鹊桥”中继星, 它不同于其他通讯卫星, 是中国为在今年年底发射嫦娥四号做准备。

成斌称, 此次探月任务突出了中国太空项目的三个特征: 加强创新, 中国借此次项目表明, 不会单纯模仿其他国家的太空项目, 而是会不断探索属于自己的发展模式; 持续性的投入, 中国的探月工程和载人项目并非以“冒进”的速度进行, 而是以平均每两年一个项目的节奏稳步推进; 扩大活动领域, “鹊桥”中继星不同于其他通讯卫星, 其使命轨道是距离月球约 6.5 万公里的绕地月 L2 点的 Halo 轨道, 是人类历史上航天器首次造访该轨道, 中国正积极表现出想要探索更多太空领域。

显然, 中国已经将太空项目和其他投资计划挂钩。这充分体现出中国想与美国在太空领域上一争高下。美国在太空科学和太空商业领域的霸主地位面临着日益强大的挑战。白宫将如何回应, 仍需拭目以待。

## 美专家：特朗普对华征税将由美消费者“买单”

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肖勒国际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威廉·阿兰·赖因施 (William Alan Reinsch) 6 月 15 日撰文称, 特朗普政府对自中国进口商品征收的关税实际上将由美国消费者“买单”。

赖因施称，特朗普政府所提的两个征税清单针对的都是能从“中国制造 2025”项目中获益的中国制造业。美国及其他先进经济体都对中国试图“替代和夺取”它们在高科技行业的地位感到紧张。关税本质上是进一步对进口商品征税，因此它会导致消费者购买的商品物价上升。总的来说，关税将由消费者“买单”。

赖因施认为，如果中国报复美国出口行业，那么这些行业的商品在中国的竞争力将会下降，且将伤害这些行业的工人的利益。一些关税针对的是零部件而非终端商品，如果美国制造商用的是中国的零部件，那么关税会提高他们的生产成本，导致其提升商品的定价，从而削弱其全球竞争力。此外，中国报复性的关税还会让美国商品在中国的售价更高，导致对中国的出口量下降。

### **美智库：中国发展人工智能不会对美构成威胁**

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网站近日载文称，尽管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技术创新能力方面仍然落后于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宣称中国人工智能（AI）的发展会对美国领导地位构成威胁的人是在危言耸听。

中国领导人认为 AI 为中国在科技领域迎头赶上提供了独特的机遇。然而，尽管中国企业和政府积累了庞大的数据集，但美国开发的先进算法使 AI 对大数据的依赖度大大降低，而中国在先进算法和 AI 芯片的设计与制造等方面仍存在短板。此外，中国在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先进制造业方面还落后美国一大截。

因此，中国需在 AI 核心技术和数据管理方面开展国际合作。有人担心中国会“窃取技术”，认为需要通过限制贸易和投资的手段来制约中国的技术和地缘政治“野心”。但这种想法没有意识到现在才来阻止中国在先进技术领域的崛起为时已晚，不但目

光短浅，还会作茧自缚。更重要的是，对美国而言与中国的合作不可或缺。打入中国蓬勃发展的 AI 市场对美国信息技术行业至关重要，特别是半导体制造商及其供应商，以及全球品牌领导者和电子平台供应商。美国 AI 团体还需要与中国的 AI 人才进行互动。

目前贸易摩擦是中美经济关系的主要议题，目前的气氛不利于两国开展合作，但双方在 AI 领域的合作将对两国乃至世界经济大有裨益。形式多样的合作有助于解决 AI 发展可能带来的主要负面效应：失业和收入失衡、经济力量过分集中以及侵犯隐私。

### **美专家：中国真正带来“威胁”的是其人才和科技**

中国给美国带来的真正威胁是其人才和科技发展，这凸显了当前中美贸易谈判的重要性。尽管贸易问题可能会引发波动，但投资者应该继续寻找机会增加对华投资。

美国黑石集团副主席拜伦·韦恩 (Byron Wien) 近日在 RealClearMarket 网站撰文称，中国给美国带来的真正威胁是人才济济、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文章摘要如下：

对中国的最大担忧不应该是可能爆发贸易战或军事冲突，而是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迅速进步给美国的经济领导地位带来威胁。以国内生产总值计算，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继续按目前的轨迹发展，中国将在本世纪 30 年代成为全球最大的经济体。

那些认为中国易受“硬着陆”影响或者像日本在 20 世纪末那样遭受通货紧缩、经济衰退的人，并没有仔细研究两国之间的区别。当时日本在海外不负责任地投资房地产，国内股价被大幅高估。中国可能过度投资工业产能和基础设施，其银行账面上可

能有许多不良贷款，但它比大多数发达国家更好地度过了 2008 至 2009 年的金融危机。事实上，许多投资者两年前担心的“硬着陆”从未发生。中国的经济成就是不可否认的。

回顾中国历史可以发现，古代中国曾拥有全球最进步和最具创造力的文明，但因闭关锁国而陷入危机，欧洲和美国逐渐在经济和科技上占据了主导地位。直到改革开放，中国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有人担心中国的创新会因言论自由受限而遭到扼杀，因此中国必须从别人那里获得技术。如今这种观点已经过时。

西方很多人都熟悉中国在信息技术方面的进步。2012 年，世界上五台最快的超级计算机中，美国拥有两台，中国一台也没有。到了 2017 年，美国仍然是两台，而中国也有了两台。中国领先的技术公司百度、阿里巴巴和腾讯也在不断发展。

西方人不太了解的是中国在生物技术方面的进步。高盛的一份报告指出，基因组医学在中国蓬勃发展。中国在该领域的计划与美国类似，且强于欧洲和日本，一些临床试验已取得可喜成果。中国也是细胞治疗领域的领导者，旨在通过利用人体自身的生物学来治疗或治愈疾病。中国在该领域进行的临床试验比美国还多。

基因编辑领域存在争议，欧洲和美国采取了谨慎的态度。中国已经成为该领域的领导者，开展了九项癌症和 HIV 感染临床研究，而美国只有一项。中国也在努力发展基因组药物制造。中国在农业研究方面处于领先地位，其研究重点在于利用基因编辑增加国内粮食产量。

中国学习科技类专业的学生由 2000 年的 35.9 万人增至 2014 年的 165 万人。同期，美国同类学生人数由 48.2 万人增至 74.2 万人。中国还开展了旨在引进在国外有建树的科学家的“千人计划”。该计划下，已有 6000 名科学家和企业家返回中国。

中国在技术方面的进步显著，这突显了当前中美贸易谈判的

重要性。真正的贸易战将导致中国、美国乃至世界经济陷入衰退。据分析人士估计，仅在去年，中国对美出口总额达到 5000 亿美元，这涉及到 5000 万到 6000 万中国人的就业。因政策造成的经济衰退会让中国失去太多。

但这并不意味着贸易谈判会迅速、和谐地结束，尽管最近中美达成了减少贸易逆差的共识。到目前为止，中国对美国政府日益增多的要求的回应是温和、克制的。中美之间有许多问题需要妥协，以尽可能避免对抗。

美国在贸易方面的要求已增加，不再局限于减少与中国的赤字。美国想要中国终止与“中国制造 2025”计划相关的国家补贴。事实上，面对西方国家的抱怨，中国可以且已经在知识产权保护、技术转让和合资企业要求等方面做出改变，但这种让中国调整其产业政策的强硬要求很难被轻易或快速地接受。

如果中国想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科技进步至关重要。历史证明，新兴经济体从低收入社会转向相对舒适的中等收入社会相对容易，但要想成为高收入社会需要进行经济改革。现在，为了缩小东西部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中国领导人寄希望于“中国制造 2025”计划和“一带一路”倡议。

总之，贸易问题引发的波动可能重新出现，但中国科技发展突飞猛进，投资者应继续在中国投资，并且寻找机会增加投资。

## 美国外交

### 美国形单影只？

美国《大西洋月刊》网站 6 月 11 日载文称，特朗普在 G7 峰会上拒绝签署联合公报，批评加拿大总理特鲁多在会上表现得

“谦逊温和”，却在离开后言行“虚伪软弱”，美国似乎形单影只。

美国外交学会高级研究员斯图尔特·帕特里克（Stewart M. Patrick）表示，特朗普似乎准备抛弃跨大西洋关系甚至是“西方”的概念，而这些都是美国参与全球事务的支柱。《大西洋月刊》称，特朗普一向对类似 G7 峰会这样的多边论坛感到不屑，因为在此类会议上多国领导人都渴望达成协议，特朗普更青睐双边谈判，譬如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会晤，因为一旦谈判成功，他便能独揽全部功劳。

现在美国的盟友们也只能听之任之，并罕见地发表反对声明，寄希望于下一位总统能与他们价值观一致。尽管欧洲国家可以发起报复性关税，但他们也会沦为贸易战的受害者。长期来看，欧洲国家更愿意相信，不论特朗普如何行动，西方价值观会将跨大西洋联盟团结在一起。

### 特朗普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具有连贯性

《纽约时报》网站 6 月 12 日载文称，特朗普当选的一个悖论是，它看起来像是对奥巴马的巨大否定，然而它又发生在奥巴马颇受欢迎的时代。在观看了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真人秀”之后，会发现特朗普与奥巴马的外交政策有一定连贯性。

他们的策略和野心很像。特朗普正试图与朝鲜达成协议，就像奥巴马试图与古巴达成协议。特朗普正在激怒欧洲和加拿大等传统盟友，同时争取缓和与对手俄罗斯的关系；奥巴马在中东地区进行了类似的调整，在寻求与伊朗缓和关系时激怒了以色列和沙特。二人都继承了小布什对全球反恐战争的一些看法。

尽管两人使用了不同的言辞，并且常常偏爱不同的盟友，但他们的整体策略相同，即试图让美国从一些承诺中脱身，把美国

的立场从以霸权换和平的“美利坚治世”模式转向与曾经的敌人达成交易、对长期盟友提出更多要求的“离岸制衡”战略。

此外，特朗普和奥巴马都面临着一个残酷的事实：美国的力量是有限的，美国的大战略已经过时或根本不存在；与上世纪末相比，21 世纪初的超级大国需要做出更艰难的选择，有更多令人更加不悦的讨价还价。

### 过往的美俄首脑会晤为特朗普提供了六大经验

兰德公司网站近日载文称，特朗普有可能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会面，为更好地筹会晤，特朗普应当从过去几十年美俄领导人高层会晤中汲取经验。

第一，个人魅力与说服技巧具有局限性。为与斯大林建立信任，罗斯福总统曾在德黑兰会议期间下榻苏联领事馆，并在 1945 年雅尔塔会议上讨好斯大林，但斯大林却在两次会议中实现了自己的大部分目标。

第二，峰会的目的在于认可权力现状，而非改变现状。雅尔塔会议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关于在波兰实行自由选举的愿望并未达成，因为当时波兰仍被苏联占领。

第三，双边关系恶化将增加风险。1960 年 5 月 1 日发生的 U-2 飞机事件使美苏关系恶化，赫鲁晓夫在随后举行的巴黎峰会上大发雷霆，会议以失败收场。

第四，相较于武器控制，美国与俄罗斯就地区冲突达成协议的难度更高。尽管美苏在 1987 年华盛顿峰会上签署《中导条约》，但当时双方仍就阿富汗问题和尼加拉瓜桑地诺政权争论不休。

第五，会前准备不足将加剧峰会失败的风险。1961 年，肯尼迪对与赫鲁晓夫的维也纳会晤准备不足，两个月后柏林墙开始

建立。

第六，美国领导人应携国会成员共同赴会。1974 年莫斯科峰会和 1979 年维也纳峰会所签署的条约均被参议院拒绝。1985 年，里根吸取经验，邀请参众两院加入军控观察团，前往日内瓦参与核谈判，最终《中导条约》和《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经参议院批准得以生效。

### 史剑道：过于看重贸易赤字将影响国家安全

美国企业研究所网站近日登载该智库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史剑道（Derek Scissors）的文章称，特朗普把目光锁定在贸易赤字上将会危及美国的国家安全，包括扭曲美国的盟友关系、削弱对中国的筹码。

特朗普 30 年来非常在意贸易赤字，他的观点自然也就改变了美国的贸易政策，继钢铝产品之后，美国又对进口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发起“232”调查。

美国超过一半的进口汽车来自加拿大、日本、德国、韩国等防务伙伴，即便贸易壁垒符合美国利益，此举也会伤害这些盟友，而且它们的报复措施将伤害到美国。同时，围绕进口汽车的争论也体现在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的谈判中。出于对贸易赤字的考虑，美国在谈判中提出“日落条款”（让 NAFTA 在五年后到期，除非双方同意延期），这可能会遭到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拒绝。尽管特朗普一向不把墨西哥当作亲密盟友，但墨西哥国内经济疲软或加剧非法移民问题，而美国一直将此视作安全隐患。从经济和安全角度考虑，加拿大仍是美国最重要的盟友。

特朗普还是总统候选人时曾批评奥巴马对美国的敌人和对手要比对伙伴好，然而他自己在与中国打交道时可以说也是如此，

因为中国可以给予的东西最多。在 2017 年美国的商品和服务总赤字中，中美之间的赤字占到五分之三，因此美国能从中找到巨大的利益。

为了实现特朗普的目标，相较于日本和欧盟而言，美国需要更积极地与中国进行协商，以获得更大收益。与中国的积极协商有着更具体的安全内涵。华盛顿挥舞关税“大棒”不是直接针对涉及其中的中国企业，而是为了减少贸易赤字。直接将制裁与国家安全挂钩也会带来风险。中国减少贸易逆差的前提条件是美国撤销对中兴的禁令。中国正试图以降低贸易赤字来打动特朗普，企图逃过因胁迫和侵犯知识产权而带来的制裁。这背后所传递的信息似乎是，只要一国能改善与美国之间的贸易赤字，就可以不遵守美国有关国家安全的法律。

特朗普对贸易赤字的看法存在错误。贸易赤字只是一种统计工具，它的存在并不代表失业，而特朗普却把贸易赤字看作是比制裁伊朗、保护知识产权、维系盟友间紧密关系更重要的问题。

### **“特金会”意义何在？且看美国专家如何解读**

当地时间 6 月 12 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和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新加坡实现历史性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美国智库专家如何解读此次会晤的意义？

#### **“吵架好过干架”**

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副主席阿隆·戴维·米勒(Aaron David Miller)和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非常驻高级研究员理查德·索科斯基(Richard Sokolsky)认为，特朗普将朝鲜问题置于美外交政策议程的首要位置，并称美国已经失去“战略耐心”是正确的，是时候该直接与朝鲜对话而非仅仅谈论朝鲜问题了。

最重要的是，这是特朗普就任以来，第一次有时间和政治空间来检验是否能够通过对话和谈判来应对美朝关系中的挑战。无论以哪种逻辑和理性标准来衡量，特朗普设定的路径远比军事行动或峰会之前的态势更可取。如果特朗普想要让金正恩限制甚至销毁朝鲜核武库与核设施，那么特朗普别无选择，只能与朝鲜最高领导人直接对话，因为只有金正恩有做出相关决定的权力和合法性。

兰德公司外交与安全项目高级研究员詹姆斯·多宾斯(James Dobbins)表示，“特金会”带来了中国长期以来一直希望看到的“双暂停”局面。专家们可能会对峰会的有限成果吹毛求疵，但是大多数美国人和韩国人会松一口气。只要“双暂停”持续，朝鲜将无法研发出能把核弹头送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

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弗尔科学与国际事务研究中心教授马修·班恩(Matthew Bunn)表示，“特金会”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大步，远离了战争边缘并走上了外交轨道，尽管几乎所有细节问题都有待解决。若要将今天的机遇转化为实际成果需要艰苦谈判，重点应放在减少核威胁以及朝鲜半岛发生意外战争的风险上。正如前英国首相丘吉尔所言，“吵架总比干架好”。

### 对美国不完全是“好事”

欧亚集团主席伊恩·布雷默(Ian Bremmer)称，朝鲜显然从峰会中获得了比美国更切实的胜利。特朗普和金正恩握手的画面向朝鲜人民表明，金氏政权追求核武器是正确的，因为这让西方人平等地看待朝鲜。

外交学会朝韩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斯奈德(Scott A. Snyder)指出，美国与朝鲜的联合声明缺少与和平和无核化进程以及4月份《板门店宣言》中的承诺有关的内容。所有这些问题都必须列入国务卿蓬佩奥领导的谈判议程中，但考虑到美朝两位领导人在联合声明中所作的承诺显然很模糊，谈判进展迅速的可以

能性并不高。

布鲁金斯学会约翰·桑顿中国中心研究员何瑞恩(Ryan Hass)表示,对于美国而言,衡量峰会成果的标准应该是它是否减少美国本土面临的威胁和加强美国在亚洲的相对地位。这一外交进程拉大了美国和其盟国之间的距离,但尚未明显减少朝鲜核威胁,可以说开头并不顺利。

布鲁金斯学会东亚政策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周思哲(Jonathan Stromseth)指出,峰会可能会对东北亚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安全格局产生长期影响。美国政府同意暂停美韩军演可能会削弱盟友和亚洲新兴安全伙伴对美国的信任。

### “无核化”任重道远

多宾斯表示,这是美国和朝鲜第三次开始步入无核化和关系正常化的轨道。以前的努力都失败了,不仅因为朝鲜人说谎,也因为双方都没有履行承诺。现在的区别在于,特朗普和金正恩在谈判进程中更早、更公开地做出承诺。金正恩在国内的地位不容置疑,特朗普已经显示出改变共和党根深蒂固的看法的卓越能力。但是,如今无核化的道路比十年或二十年前要长很多。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迈克尔·欧汉龙(Michael O'Hanlon)表示,只有当平壤的行为出现了长期而有意义的改变,才能保持对这次峰会以及它对美朝关系意义的乐观看法。金正恩暂停核与导弹试验仅仅是一个开始。因此,责任落到了国务卿蓬佩奥的身上,因为他将负责峰会后的实质性谈判。

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韩国研究主任车维德(Victor Cha)与该中心高级研究员金秀美(Sue Mi Terry)认为,对于未来的谈判有两点值得期待:势头和成果。外交往往关乎势头。峰会之后,谈判必须取得一些早期成果或“胜利”,以便各方在这一过程中树立信任并投入政治资本。将这一进程与以前的失败尝试区分开

来的最重要的步骤是，全面完整地公布朝鲜的核武器、核设施以及相关知识，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对此进行充分验证。同时，美国和其他地区合作伙伴必须保持强有力的协调，以确定未来在外交、安全和经济上给朝鲜多少好处。“特金会”创造的外交势头将是实现该地区持久和平的关键。

## 美国政治/其他

### 多数美国人认为美保持太空领域的领先地位至关重要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网站 6 月 6 日载文称，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美国继续在太空领域保持领先地位具有重要意义。

皮尤研究中心于 2018 年 3 月 27 日至 4 月 9 日进行的调查显示，72% 的美国人表示美国必须继续在太空探索领域保持世界领先地位，而 80% 的人则表示，空间站对美国而言是一笔不错的投资。此外，尽管私营部门越来越多地涉足太空领域，比如 SpaceX、蓝色起源和维珍银河等公司，仍有 65% 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应该继续在太空探索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而另外 33% 的人认为即使没有 NASA 的参与，私人公司也能确保美国在太空探索领域取得进步。

在这些调查结果发布之际，NASA 发现如今的世界与半个世纪前“阿波罗”号首次登陆月球时截然不同：冷战时期的太空竞赛已经成为历史，但其他国家（包括中国、日本和印度）已经成为太空探索领域的重要国际参与者。

## 为打击洗钱活动，美政府应结束美企的匿名所有权

美国哈德逊研究所网站 6 月 12 日载文称，美国国会必须尽快改革美国的反洗钱体系，并且从结束美国企业的匿名所有权入手。

对空壳公司的匿名所有权听起来像是会计师会遇到的问题，但事实上它对美国国家安全带来了最严重的威胁。美财政部在国会没有行动的情况下采取了临时措施，譬如要求金融机构识别新客户的真实身份。但最终这些措施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同时也给私营部门增加了更多责任和繁文缛节。只有国会才能提供全面的法律解决方案。然而，令人深感失望的是，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提出的《反恐怖主义和非法金融》法案并不包括实施受益所有权登记的计划，更谈不上终结企业匿名所有权了。

国会必须尽快启动美国反洗钱体系改革的复杂进程，以适应 21 世纪的新变化。作为第一步，结束美国公司的匿名所有权是切断在美国和全世界造成严重破坏的盗贼、恐怖分子、毒贩、人贩和其他罪犯资金的最可靠途径。

## 美媒：特朗普政府不欢迎科学和建议

《纽约时报》网站 6 月 9 日载文称，特朗普准备会晤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就无核化这个多年来一直困扰世界的问题进行谈判，但他没有得到白宫科学顾问或受过核物理培训的资深顾问的帮助，特朗普政府不欢迎科学，也不欢迎建议。

自 1941 年以来，特朗普是第一位不任命科学顾问的总统。这是二战时期创建的一个职位，负责就核战争、全球流行性疾病等专业问题为白宫提供技术指导。白宫高层缺乏传统科学顾问反映出特朗普政府较往届政府有一个重大变化：科学在美国政策制

定过程中被边缘化。

国务院没有首席科学家，而科学是网络安全和全球变暖等外交政策问题的核心。农业部也没有一位首席科学家：去年特朗普提名了萨姆·克洛维斯（Sam Clovis），一位没有科学背景的前脱口秀主持人，但他婉拒了提名，自那以来没有新的提名。此外，内政部以及国家海洋与大气管理局都解散了气候科学顾问委员会。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解散了其食品顾问委员会。这些决定对公共健康和安​​全以及经济都有影响。

普林斯顿大学地球科学和国际事务教授迈克尔·奥本海默（Michael Oppenheimer）表示，更大的问题是，白宫内没有一位与特朗普关系密切的资深顾问，也没有一位能让特朗普信任而且愿意倾听其建议的顾问。最紧迫的地缘政治需求可能在核外交领域。

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加勒特·马奎斯（Garrett Marquis）强调，总统的许多顾问“都拥有高学历，并且在政府内外都处理过这些复杂问题”。尽管如此，在特朗普为会谈做准备时，没有哪位助手能与帮助奥巴马与伊朗谈判核协议的顾问相比。

核物理学家欧内斯特·莫尼兹（Ernest J. Moniz）说：“谈判要求做出取舍，这些判断最好由具有专业知识和丰富政治经验的人做出。而这届政府中没有这样的人。”

## 兰德公司：美国“千禧一代”是这样看待“安全”的

若按“世代”（generation）来划分，美国“千禧一代”是最不担心安全问题的群体，然而，他们是对经济感到最为焦虑的群体。

“千禧一代”在美国的影响力日益上升。虽然“千禧一代”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已被广泛讨论，但他们对安全的态度尚未得到仔细研究。为此，兰德公司于2017年6月至7月对1608名美国成年人进行了抽样调查。调查报告摘要：

美国人口普查局将“世代”定义为共同经历过具有统计意义的人口事件的群体。“千禧一代”（millennials）指生于1982年至2000年的美国人；“X一代”（Generation X，也称“未知世代”）指生于1965年至1981年的美国人；“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指生于1946年至1964年的美国人。

据人口普查局2015年的统计数据显示，若按世代结构来划分，“千禧一代”在美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最高，占比26%达8430万人；其次是占比23%的“婴儿潮”一代（7540万）和占比22%的“X一代”。到2040年，“千禧一代”在美国人口中的占比将更高。随着这些年轻美国人在政治、媒体、学术、商业等各个领域越来越突出，他们的态度、偏好和信仰在美国政策和公共话语中可能会越来越重要。

调查结果显示，对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忧往往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加剧。最担心朝鲜、俄罗斯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是“婴儿潮”一代，其次是“X一代”，最后是“千禧一代”。从具体议题来看，三代人对于朝鲜核计划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看法的差异较大，但对于俄罗斯不断增长的威权主义看法的差异要小得多。总体上，“千禧一代”和“X一代”对这些问题的担忧程度明显低于“婴儿潮”一代，同时，“X一代”和“千禧一代”之间看法的差异较小。

尽管所有受访者都表示，生活在民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但认为“非常重要”的人最多的是“婴儿潮”一代，其次是“X一代”。“千禧一代”中认为生活在民主国家“非常重要”以及“某种程度上重要”的比例最低，分别为66.2%和29.5%。

“千禧一代”中很多人对经济感到高度焦虑。53%的“千禧一代”担心每个月能否实现收支平衡，近81%的人担心储蓄不足，68%的人担心不能偿还债务，36%的人担心失业。调查发现，“千禧一代”和“X一代”比“婴儿潮”一代更担心自己的财务状况，且前两代人之间看法的差异较小。

这些发现并不令人惊讶，经验较少的年轻员工与年长的、有经验的员工相比工资和家庭收入自然更低。然而，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目前这几代年轻劳动者的收入比前几代人在同一时期要低，这表明这个群体一生之中赚的钱不会超过前几代人。

有三个主要因素似乎可以解释这三个世代之间为何对国家安全和经济安全看法存在差异。首先是代际因素。由于生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世代的人有着不同的经历。譬如，“婴儿潮”一代之所以比“千禧一代”更担心俄罗斯，是因为这一代人经历了冷战。其次是调查时间段因素。调查展开的时间也会对调查结果产生影响。如果调查发生在“大衰退”（或之后漫长的经济复苏阶段），那么受访者对经济的焦虑可能会更高，且不同代际之间也存在差异。最后是年龄因素。某个年龄段的人可能具有相同的经历。譬如，20岁左右的人会更在乎学生贷款，50岁的人则可能更关心为退休后的生活做打算。

本刊所载文章的观点不代表本刊编辑部观点，仅供读者参考。

编辑部：上海市美国问题研究所

地址：上海市淮海中路622弄7号社联大楼201室

邮编：200020

电话：021-33665148

工作邮箱：[bianjibu@sias.org.cn](mailto:bianjibu@sias.org.cn)